

東亞的宣教——論其歷史脈絡

莫飛特著 葉約翰譯

The *Taiwan Journal of Theology* is thankful to the author and to the Editor of *The Princeton Seminary Bulletin* for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and publish Dr. Moffett's article, "Mission in an East Asian Contex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article appeared originally in *PSB* 3 (1982), 242-251, and was the first lecture in the 1981-82 Student Lectureship on Missions. Dr. Moffett is Professor of Mission and Ecomenics at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He was formerly a missionary in China (1947-50), thence in Korea where he was Associate President of the 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chool in Seoul. The *TJT* hopes that by translating and publishing this article, it will make Dr. Moffett's lecture more widely available in Asia. The article was translated by John Yieh.

以歷史觀點研究東亞的宣教有個實用的副產品，就是足以證明基督教在亞洲宣教最常遭遇的批評——基督教是令人反感，外來的西方宗教；不屬於亞洲——乃是錯誤不當的。這種批評有時是來自不斷累積的誤解；有時是因為對於歷史的無知。任何一個原因都會造成傷害，但它們其實都是錯誤的。

在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中有一條關於主後八八三年的記載很發人深省。有一次，阿佛列王為了保衛英國的基督徒，奮不顧身地與異教徒的丹麥人作戰。倫敦被包圍；英國士兵築營抵抗。這時，阿佛列立了一個誓，在上帝和那些勇敢的撒克遜人面前許願說：如果丹麥人被擊退，倫敦解危，他將奉獻禮物，送到基督教的聖地去。結果，他的禱告應驗了。那些異教的野蠻人果然停止進攻退回海盜船。阿佛列就按他所許的願，派了兩名特使，從位於最邊緣尚不穩定的灘頭堡，帶著奉獻的禮物回到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聖地。

既有趣又令一些歷史學家百思莫解的是，這些禮物不只送到羅馬——這是預料得到的地方——也被送到「印度給聖多馬與聖巴多羅買。」（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A Revised Translation, Dorothy Whitelock, ed.; P,50）。後來另一位編年史的作者馬莫培理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這是十二世紀的文件）又加上一筆說，這些撒克遜的特使從印度回來，「滿載著那裡盛產的奇珍異寶與香料」——東方的老基督徒送給英國的新基督徒的禮物。

阿佛列王時代「印度」的確實地點，學者仍有爭論。這些特使可能只到了聖多馬的神龕地艾德沙（Edessa），或到了南阿拉伯而已；因為在當時的文獻中「印度」是非常含混的名詞，但他們也並非不可能到達印度。不過，整個故事最有意義的是，它提醒我們，第九世紀知道一件十九世紀與廿世紀太常忘記的事實：基督教不是一個西方宗教。基督教理所當然地屬於亞洲；從歷史淵源來說，也是屬於亞洲，就像它也屬於歐洲一樣。一千年前撒克遜的國王就知道他成為基督徒，不只應該感謝鄰近的羅馬，也該感謝遙遠的亞洲。

相反地，即使在我們這個普世運動的時代中，西方的教會歷史有時仍然忽略了亞洲。我們與保羅一同離開耶路撒冷和安提阿，然後（稍微修改徒十六16）「被聖靈禁止在亞洲傳道」。就像這樣，我們飛快地向西遷移到希臘、羅馬、以及普里茅斯洛克，卻很少回頭；直到我們西方的宣教師重新發現亞洲為止。其實，我們這樣做已經嚴重地損害了向世界宣揚基督信仰的大目標了。

當基督教世界與阿佛列相反，忘記了它古時曾欠亞洲一段恩情的時候，它若非因而造成也無異大可不必地加深了一層基督信仰原應極力避免的印象——基督教是西方人為了以宗教侵略其他世界，在西方制定的一套信條。

我們原可以像親戚般回家去報恩。但我們已忘記這段恩情，以致在許多亞洲人眼中，我們不像朋友，倒更像征服者。到中國傳教的一位耶穌會士利馬竇，曾用盡各種辦法想使自己的生活中國化，想使福音中國化。他的確試過了各種辦法，卻獨缺歷史的方法。一六〇〇年他到達北京，雖然穿上中國衣服，卻仍舊是個外國人。當他要求謁見皇帝時，權重一時的禮部官員參奏不要接見他。他們寫道：「歐洲與我們素不相干。」這個人的「說教是毫無價值的。不要讓這種奇言怪論進入宮廷。」他們與利馬竇都忽略了基督教在東亞宣教的歷史脈絡。倘若利馬竇知道歷史的脈絡，也許他請求的方式會完全不同而且更為強而有力：「我不是要把歐洲的奇言怪論帶來中國，」他也許會說：「一千年前你們的一位皇帝曾禮遇像我一樣的一個基督教宣教師。他邀請他來講道，甚至幫他建立一座教堂。」可惜長久以來，西方已經忘記這段短短的歷史。利馬竇被視為一個歐洲信仰的

異國特使，竟因而白等六個月沒有見著皇帝。

我們為什麼還要讓亞洲——或世界各地——繼續把基督信仰看成西方的呢？其實，它的歷史比探險時代更久遠。基督教起源於亞洲——那是耶穌誕生之處。在向西傳入歐洲之前，或至少同時，它就已向南傳到非洲，向東到達亞洲了。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教會歷史就會呈現不同的風貌。

第一個基督徒國王不是君士坦丁，不是一個西方人，而是亞洲人。君士坦丁歸信基督時沒有結束大迫害，反而開始了最大的迫害。當羅馬皇帝變成基督徒時，西方歡欣鼓舞；但是在波斯境外的亞洲卻沒有快樂。以前羅馬皇帝把基督徒看成帝國的敵人時，波斯待他們如同朋友；在兩百五十年間，波斯成為躲避羅馬迫害的基督徒難民藏身之處。現在，一切全都走樣了。羅馬變成基督徒，他的老敵人波斯反而成了敵基督者，跟著大屠殺也就開始了。

一位歷史家所佐門（Sozomen）在恐怖的日子結束後寫道：亞洲殉道的基督徒真是不計其數。單單那些著名的殉道者就有一萬六千人。慘烈的情況遠比在羅馬統治下的迫害更加惡劣；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波斯的迫害中背道的人數卻比較少。我們應該向這些亞洲早期的基督徒那堅定不移的勇氣致敬！

第一座著名的教堂（不同於家庭教會）是在亞洲；新約聖經主要部分的第一本翻譯是譯成亞洲的一種語言；而基督教時代第一千兩百年內最偉大的宣教運動也發生在亞洲。事實上，歷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宣教運動，除了羅耀拉（Loyola）以後的羅馬天主教或加利（Carey）之後的新教以外，就是東方教會聶斯托留派的宣教了。他們跨越整個歐洲，從紅海到太平洋，錫蘭到西伯利亞邊境。十三世紀有一段短暫的時間，有一位也許可稱為中國「教皇」的，統治著亞洲大部份的基督徒——他是一位蒙古的修道士，後來成為忽必烈汗（元世祖）的大使，差點被聶斯托留派的基督徒綁架去作巴格達（Baghdad）的大主教。倪勒（Neale）在東方教會史（*History of the Eastern Church*）中說道：「即使是意諾森三世（在羅馬教皇最高峯時）是否會比加利弗（Caliphs〔巴格達〕）城的〔聶斯托留派〕大主教擁有更多的靈性權威，那也是令人懷疑的。」

今日的亞洲宣教唯有架構在古代亞洲歷史的脈絡以及悠久的歷史留給

各個傳統亞洲文化的豐富內涵之中，才能夠發揮作用。但是，如同四百年前利馬竇的時代一樣，今天大部分的宣教師，甚至他們的亞洲同工，卻仍未了解。亞洲的教會其實擁有比現在更多的價值。它們有權去認識並發揚它們自己亞洲的基督徒遺產。

這筆遺產始於一個古老，只能藉傳說描述的教會。它由兩個中心擴展開來。一個是印度；另一個就是羅馬境外的敘利亞東部。這兩個中心都源於同一個使徒聖多馬。若是傳說可信，使徒多馬到亞洲宣教的日期比保羅到西方宣教還早。傳說當然不是歷史，但它們的核心常常包藏著歷史。無論如何，多馬的傳說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亞洲教會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不僅屬於教會歷史，也屬於非基督教的亞洲了。「記住，」有位印度總統拉顏德拉普拉薩（Dr. Rajendra Prasad）博士幾年前曾說：「要記住，許多歐洲國家還沒接受基督教之前，聖多馬就已經來印度了。所以，承繼他的印度基督徒比許多歐洲的基督徒有更悠久的歷史和更長遠的血統。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事！」（比較中國與其態度和利馬竇。了解歷史大可消弭文化對福音的敵對態度。）

大略地說，教會的亞洲（非西方）地區是從幼發拉底河——羅馬帝國的東界，希利尼文化與東方交接之處開始。根據傳說，十一個門徒聚集在耶路撒冷時，曾計劃如何實踐耶穌所說「你們要到普天下去傳福音」的命令。這是記載在第三世紀初的一本新約偽經多馬行傳上。門徒決定要用抽籤的方式來劃分他們宣教的地區，正如他們用抽籤選出一個接替加略人猶大的門徒職分一樣。結果，多馬抽中去印度宣教的籤，但他立刻表示疑懼。「我太軟弱無法到那麼遠的地方去，」他說，「而且，我也不懂印度話。」雖然主在異象中向他顯現，他仍然不願去。於是主親自動手，把多馬賣給一個替國王昆達法（Gundaphar）物色木匠的印度商人作奴隸。多馬才無法拒絕而去了印度。多馬是個懷疑者；勉強的宣教師。作為亞洲的使徒，這實在不是個好的開始。

本文無意辯論這個古老傳統的歷史性。學者對於這個傳說大多不太重視。他們很有耐性地指出，印度從來沒有一個叫昆達法的國王，而且傳說中的神蹟顯然是難以置信的。後段的說辭倒是真的。不過，十九世紀中葉，有個探險家在靠近印度與阿富汗邊界一帶找到一些錢幣，令人吃驚的是

上面赫然刻著印度國王昆達法的名號。研究的結果證實這些錢幣是第一世紀的東西。可見，傳說並不全是神話。當然，印度有昆達法王還不能因此就肯定多馬確實到過那裡。

另有一個更奇怪的傳統也與使徒多馬牽扯在一起那就是另一個亞洲最早的基督教中心艾德沙（Edessa）如何建立起教會的故事。艾德沙是位於東西兩強羅馬與波斯之間勉強維持獨立的一個小侯國的首都；座落於兩條貿易要道交會點上：一條是向東直通印度、中國的古絲路；另一條則縱貫南北，連接非洲和敘利亞。

教會歷史之父優西比烏（Eusebius）也把多馬與艾德沙教會的創始牽扯在一起。但這個故事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它是根據一些在艾德沙城市檔案處發現的信件寫成的。這些信件據說是歐斯洛尼的黑色阿布甲王（Abgar the Black of Osrhoene）與耶穌通信的親筆信函。阿布甲王寫信要求耶穌醫治他的惡疾，耶穌遺憾地回覆他說：「我必須先在這裡完成我受差遣的任務。」根據優西比烏，耶穌繼續說：「完成之後，我將被提到那差遣我來的那裏去。當我被提的時候，我將派遣一位門徒去醫治你所受的苦，給你生命。」耶穌升天之後，這個任務就交待給多馬；而多馬派塔底忒斯（Thaddeus）（也稱阿戴 Addai）——路加福音十章提到的「七十個人中的一位」——去艾德沙。阿布甲得到醫治就歸信基督，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基督徒國王。

這當然不是真的故事。但是，即使是充滿幻想的傳說也會包含一點真理。阿布甲王並非絕不可能成為第一個基督徒國王；歐斯洛尼也非不可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然而，不是發生在優西比烏筆下的黑色阿布甲王時，而是再過一百五十年以後。他所謂信函的故事太令人難以置信了；但是，西甲（J.B. Segal）在他所著的艾德沙詳史（*Edessa; the Blessed City*, p. 70）中指出，他握有一些若非絕對也算相當可靠的歷史證據，可以證明黑色阿布甲王的直系子孫阿布甲大帝（從主後一七七年到二一二年統治艾德沙）確實成為基督徒，而時間比君士坦丁早了一百年。

一個國王歸信基督教是否值得誇口，這只是艾德沙宣教中次要的問題。這次宣教最大的意義莫過於它代表福音衝進了另一個文化；衝出羅馬邊

界進入了亞洲。歐斯洛尼比起希臘或羅馬都更為波斯化。它的統治者是說亞蘭語的阿拉伯人。它原來的宗教是亞洲的拜星教。它是東方的，而非西方的。

另一個重要意義是：使福音得以進入亞洲的「上帝橋樑」（使用麥高文 Mc Gavran 的話）是猶太基督徒，而非希利尼基督徒團體。有關艾德沙接受福音最古的記載（the Doctrine of Addai，約第四世紀）說：多馬底來傳福音的阿載先到托畢亞斯（Tobias）的家。他是猶太人托畢亞斯之子。那是一個自然的橋樑，傳福音的人是猶太人，他們在米索不達米亞的猶太人團體中自然受到尊重。這些團結的猶太人因為都認識舊約聖經，又都反對他們周圍的異教，早就預備好接受福音了。

在印度的情形有部份可能也相同。在那裡很早就有猶太人的團體，另一個有關多馬的傳統，即多馬行傳，曾提到他往印度途中第一個信主的人是一個在安德拉波里（Andrapolis）的王宮中吹笛的猶太少女。

如果猶太基督徒是第一波進入亞洲的宣教師，那麼，第二波就是敘利亞人——東部的敘利亞人了。歐斯洛尼的語言是敘利亞語。很早以前，藉著傳道者猶士丁的門徒敘利亞人他提安，艾德沙就已經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來傳福音，而不是用通用希臘語（Koine）了。他提安覺得福音的記載受到羅馬的亞洲語言——希臘文——的束縛，所以把他們譯成敘利亞文。直到這時，福音才獲得動力，傳出都市，開始散布到鄉下去（參 F.C. Burkitt, *Early Christianity Outside the Roman Empire*, p. 12）。在這裡，我們也可看出聖經翻譯對於教會增長的重要性。

他提安不以亞洲人為恥並且強調他是亞洲人。在致希臘人（Address to the Greeks）中他驕傲地宣稱：「我是個亞述人。」並且繼續述說亞洲（事實上指整個非希臘的世界，因為他也包括北非）如何勝過西方的一切優點。希臘人從那裡學習天文學呢？從亞洲。甚至他們的字母，詩和音樂，以及郵政系統也都是從亞洲學來的。「在任何方面，東方都勝過西方」他說，如果我可以大概傳述他的話，他會說：「尤其是宗教，基督教那也是從亞洲傳來的；它遠比希臘人的哲學或原始宗教更古老更真實。（第一章）。

艾德沙與它的姊妹小邦阿迪貝尼（Adiabene）成為深入亞洲的宣教

中心。它是羅馬帝國以東地區教會的母會，它也深以成為全世界都看得見的見證為傲。第一個關於基督教堂建築的記錄是在艾德沙編年史（Chronicle of Edessa）主後二〇一年那一欄——有次洪水沖壞了「基督教堂的正堂」。在那年之前，宣教師們已經把福音帶到波斯帝國各地去了——從羅馬帝國邊界到興都庫什山脈，從亞美尼亞到波斯灣。

敘利亞宣教師顯然大部分是來自沙漠和洞穴地區的苦行僧。他們成為東方教會以及埃及聖徒的模範。不過，埃及的隱修士與這些敘利亞的苦行僧仍然有很大的差別。在埃及，隱修士的呼召是出世；在亞洲，除了極端的 Encratites 派之外，至少在早期，他們克苦禁慾的呼召則還要加上入世傳福音和服務他人。艾德沙的苦行僧沒有變成隱修士，反而成為周遊四方的宣教師，到處醫治病人，施捨窮人，宣揚福音。在一篇研究早期敘利亞傳統的論文中，穆瑞（Murray）形容他們是：「跟隨無家可歸之耶穌的無家可歸之人……在世界上不停地踏著朝聖的旅途。」他們不斷地向東遷移，橫過沙漠，開始攀越中亞的高峯峻嶺。在第二世紀末之前，艾德沙的巴岱山（Bardaisan）報導說：甚至在裏海附近的基拉尼人（Gilanian）中，以及現在的阿富汗的巴克提亞人（Bactrian）中已經有基督徒團體興起了。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在基督死後不到兩百年，這些「跟隨無家可歸之耶穌的無家可歸之人」，這些東方教會的宣教師，就不祇把福音帶出羅馬境外，甚至已經橫越半個亞洲了。

但那時，他們進軍的基地——艾德沙——已快被攔入西方版圖了。基督徒的好朋友阿布甲大帝死後不久，他的歐斯洛尼王朝滅亡，於是艾德沙與波斯的關係中斷，成為羅馬的一個殖民地。這股敘利亞的宣教浪潮頓失動力，亞洲宣教第三波只好等待波斯基督徒了。

正如教會歷史上常見的，失敗的經驗適足以為新的開始鋪路。波斯時期從第三世紀初到七世紀初為止，共經四百年。在這段期間，第一次出現一個向亞洲人宣教，有組織的亞洲基地，以及將把教會的東界推過世界屋脊直到一個當時尚未知名的太平洋岸邊的一套宣教策略與訓練模式。

這個過程的進展非常緩慢，我們對它也只了解一部分。但它的開始是先有一個神學院與共同的神學信念，一個內聚力強而不太願意分離的教會

，以及一股東方修道院培育出來的宣教精神。這個神學院就是艾德沙學院，有時稱為波斯人的學院；這個教會就是東方的教會——其實教會本來就是東方的；——後來被稱為聶斯托留派。

羅馬佔領艾德沙時，就把那裡的教會併入西方，卻把神學院逐入波斯。這樣說不太忠厚，但結果是波斯佔盡了便宜。艾德沙的教會並沒有衰落；相反地，它更為興旺，產生了許多學者、聖徒與主教。它也變得富裕起來，事實上，在第四世紀，甚至蓋了一座純銀的教堂來奉祠遠從兩千英哩外的印度迎回的聖多馬的骨骸。

但艾德沙的榮耀並不在於擁有銀龕，而是它那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學院。它可能與西方第一所亞歷山大的神學院一樣早就存在了；就是在第二世紀後半葉。無論如何，它在往後的五百年間一直是亞洲神學研究的主要中心——即使它曾被趕進波斯，甚至當波斯落入回教的勢力範圍之後。它所用的敘利亞語言則「如同拉丁文成為歐洲的基督教語言一般，成為亞洲的基督教語言。」（R.A. Aytoun, *City Centres of Early Christianity*, p. 135）。

到了第五世紀末，西方的神學論戰激烈沸騰導致大分裂，把教會撕成三部份（正統派，單性論派與聶斯托留派）。艾德沙有個單性論派的主教，被大多數神學生稱為「瘋狗」主教；他認為艾德沙學院有聶斯托留派的嫌疑，就說服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把它判為異端而關閉。但是神學院的院長納西士（Navises）——他被朋友稱為「心靈之琴」而被敵人稱為「痲瘋病人」（意指患了神學痲瘋病的人）——並沒有服從命令，只是將神學院遷過邊界到只有四十英哩外的波斯境內。結果西方失去了東西兩方智識交流最有效的管道，而為波斯所獲得。這個神學院成為波斯的基督徒學習希臘教父，甚至希臘哲學與邏輯的中心；在那裏拜占庭的羅馬人、敘利亞人與波斯人和平地相處。而這一切，西方都失去了。

這個神學院安全地遷至亞洲本土後就突飛猛進。它被認為是尼西比學派而把新的生命與知識注入波斯教會。課程的重心是講究冷靜條理的聖經釋義；這是師法反對亞歷山大與西方的寓意解經法的莫布梭提亞的提奧多爾（Theodore of Mopsuestia）。在充當臨時校園的駱駝場上，到處是學生，註冊人數超過一千人。很難得地，第五世紀當時的校規至今仍然存

在；它也與聖經研究一樣，講求冷靜條理的原則。上課時間從黎明開始。神學生不准進入酒館，閱讀世俗的書籍、乞討、偷竊、結婚、或儀容不整。（參閱 J.B. Chabot, "L'Ecole de Nisibe, Son Histoire, Ses Status" in *Varia Syriaca*, I, 55）。

把神學院逐入亞洲的悲劇性衝突至少還有一個正面的結果——使波斯教會建立一個新的自我認同感，一個比西方小但也許因而更強烈的認同感；使它自覺該屬於一個國家，不再徘徊於波斯與拜占庭兩強之間。既然它被西方排斥，就完全忠於波斯；不再依賴西方教會，並與之平等而立。波斯首都塞路西亞——克特西奉（Seleucia - Ctesiphon）的大主教也號稱他無論在羅馬或君士坦丁都是最高的權威。

同樣，波斯教會在神學上受到西方排擠，又受尼西比學派（School of Nisibis）的刺激，變成了聶斯托留派。它也為聶斯托留辯護。在東方教會眼中，聶斯托留於放逐中死亡其實是一種殉道。從十九世紀才逐漸為人所知的他的行為來判斷，聶斯托留似乎一點也不像是西方教會所說的異端份子。他從未否認基督的神性；他只堅持該把基督的神性與人性清楚地加以分別。東方教會可以名符其實地稱為聶斯托留派。由於政治上成為波斯人，神學上成為聶斯托留派，它明顯地與西方分離了。它變成亞洲的。

從這個神學、教會與國家的中心出發，聶斯托留派的宣教活動開始勢如破竹地向亞洲東部展開。沿著曲折的古絲路，從羅馬邊境蜿蜒直到中國黃金般耀眼的首都——長城下的長安。他們的宣教師開始向游牧民族，西伯利亞大草原的黃教（譯註：西伯利亞北部土著所信奉的原始宗教）戰士傳福音。

這些人就是中亞的匈奴人。第六世紀有個作者曾描述聶斯托留派宣教師與他們接觸的情形。大約公元五百年時，兩個基督教宣教師來到巴克提亞（Bactria），現在的阿富汗北邊。他們兩人都是平信徒，其中一個是製革匠。他們發現那裡已有幾個基督徒，是被匈奴人俘虜來作奴隸的。後來又有些經過封立的宣教師——一個主教和四個神父——加入，他們只停留七年，但這兩個平信徒留在那裡達三十年。據說這七個宣教師過著極簡單的生活，每天只吃七塊麪包和一罐水。他們傳揚福音，領人信主，為人施洗，甚至在某些與土耳其人的部落有來往的匈奴人中封立了一些神父。

除了傳道之外，他們還加上教育——教匈奴人把口說的語言寫成文字。不久，有位經驗豐富又胸襟開闊（因為他一定是個單性論者）的亞美尼亞籍主教加入他們的宣教工作。他教那些信奉基督的土耳其人種植蔬菜玉米。到了這個世紀末已有許多土耳其人成為基督徒，所以當拜占庭的羅馬人來與他們作戰時，竟然發現所有被俘的土耳其人前額上都紋刺著十字架。正如閩嘉納（Migana）所說的，這真是個極大的諷刺！今天「土耳其」這個字成為回教的同義字，可是事實上他們的祖先在穆罕默德出生以前就已經作基督徒了。大約主後六四〇年當回教徒開始從沙漠攻進波斯時，在波斯帝國遙遠的另一邊，波斯的宣教師也正因有大批人歸信基督而歡欣鼓舞。土耳其各部落的國王接受了基督信仰，還把整個部落都帶進教會。（A. Mingan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st*, pp. 303 ff.）

就在那時，在更遙遠的東邊有一更富戲劇性的突破展開了。那是主後六三四或六三五年，當時有個波斯宣教師，他是阿培拉（Arbela）或克特西奉（Ctesiphon）的僧人，參加一個商隊，沿著古絲路從安提阿橫過波斯全境直到帕米爾（Pamirs）的雪原地帶。在洛珊（Roshan）與弗嘉納（Fergana）〔兩地現在都屬蘇聯〕之間的某個無人冰地中有個地方叫作石塔（Stone Tower）。羅馬商隊有時會在此遇到一隊風塵僕僕遠從中國來的駱駝商隊，於是用羅馬的黃金去交換中國的絲。（看 L. Halperin, "The Lands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China,"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xii, pp. 96 ff.）這位疲憊不堪的宣教師也許是說服了蒙古的騎士，秘密地加入中國的駱駝隊伍，經過兩千英哩的長途跋涉，穿越世界最孤絕的荒原，終於到達中國。

這是第一個宣教師到達遠東的情形。直到十七世紀時發現著名的景教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作阿羅本（Alopen）。很可能，他極驚訝地發現中國的首都長安竟比他自己波斯帝國的首都克特西奉（Ctesiphon）還要大，而且唐太宗對他非常禮遇。這也許是因為唐太宗的祖母也是土耳其人，甚至有人說她是一位聶斯托留派的基督徒；或者是因為中國人一向好學勤習。唐太宗發覺這個波斯人帶來的新信仰是一本書的宗教，就賜他住在華麗的御用圖書館中，並命他開始翻譯聖經。三年後，他從自己的寶庫裡取

出一筆錢供宣教師建造中國第一座基督教會。那是在主後六三八年。兩年後，即六四〇年，在四千英哩外的波斯首都——宣教師的家鄉，也是亞洲基督徒的大主教駐在地——陷入了新興而兇悍的回教徒軍隊手中。聶斯托留派第一回合的宣教也就跟著開始沒落了。

但是基督教已經傳進東亞了。聶斯托留派第一回合的宣教雖然失去了基地，卻仍然存在，甚至繼續傳佈達三百年之久。福音的東傳完全是經由亞洲；而且是亞洲人而非歐洲或美國的西方人傳進去的。基督教在亞洲不是「外國的」；它原本就是亞洲的。這是歷史脈絡給我們的第一個教訓。讓亞洲的教會亞洲化吧！

還有其他的教訓可作為本文的結論嗎？我當然還記得本文的目的是想提供有實際價值的信息。

亞洲的第一波宣教，由聖多馬開始的猶太基督徒宣教，怎麼樣呢？如果我們敏感一點，它豈不是在暗示：對於一個宣教師來說，某種程度的勉強並非缺點。謙卑與少量的自我懷疑比驕傲自信更像基督也更為有效。一個西方的宣教師要到仍然深深記得十字軍東征的亞洲去，如果能自奉為耶穌的奴隸而非十字架的戰士，那將會好得多！不過，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們要學習的教訓不是勉強；真正的教訓乃是：那些最早的宣教師們無論出於勉強或樂意，他們都是在「傳福音」。

第二，敘利亞人那一波呢？他們的生活方式非常簡樸，甚至克苦禁欲；並且使用當地人的語言。現在對於美國人而言，簡樸的生活或外國語言都不是容易學習的。所以我們實在必須比我們願意的更加努力向這些「走遍世界各地不停地朝聖，跟隨無家可歸之耶穌的無家可歸之人」學習。

第三波是波斯宣教師。他們有聖經的訓練，神學的裝備，又熱心栽培，全心全意設立教會。有人說這些聶斯托留派的宣教師本色化的速度太快，結果產生混合主義的教會——即擁有基督教的外表卻懷著佛教心態的基督徒。這種批評也許部份正確，但不如說他們不夠本色化。因為當第十世紀，聶斯托留派的第一回合宣教在中國失敗時，它仍舊是波斯式的，而非中國式的。經過了三百年的宣教，它仍舊是「外國人」的教會，難怪會消失得無影無踪。

但它並非永遠消失。正如教會總是死而復活般，它又回來了。也許從

這篇概論中，我們要學習的最重要的教訓是耐心、恒心，尤其是信心——是信靠宣教，也不是教會，而是信靠上帝。教會也許會被消滅；但是聖靈永遠不會放棄。聖靈就像陣風與波浪一般。「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裡來，往那裡去。」（約三8）海浪前進，後退；退潮，退潮。在亞洲，已有七波的宣教了。我們只看了其中的四波。有人說我們這個時代又是退潮的時候。或許是的；但我懷疑。就算它是吧，我卻仍然可以信靠聖靈。往後還將有許多波宣教不斷地湧進亞洲。至於誰為下一波命名？我不知道。也許那將是像很久以前一樣又是亞洲人自己的宣教運動。但無論是什麼名字，它都必須帶給人類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聲。它也必須使那個名字中國化，印度化與阿拉伯化，像是一個更偉大的句節一樣，直到世界各國都成為我們的上主與救主耶穌基督的國度。

我去年夏天在歐洲參加 兩個加爾文學術會議（下）

徐謙信

神學博士 台灣神學院兼任教授

This is the second part of a report of the author's participation in two conferences held in Europe in the summer of 1982.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reports the content of three major lectures on Calvin, together with his participation in two English seminars, and a tour "On the Track of Calvin's Geneva." He also records his meeting with a former teacher and new friends, and his assessment of the conferences as a whole.

I

（1）再回到「加爾文講堂」並路過「宗教改革國際紀念碑」

今天（9月7日星期二），早上我們因為較晚起床，所以到餐廳的時候，供應的早餐快要結束了，但櫃台的女侍卻知道我倆是來參加加爾文學術會的客人，並告訴我們今日早餐和昨天一樣都有加送飲料。等我們用完早餐之後，其他的參加者都已經先走了。所以只好依照昨天返回市立大學的路程，向西北方向走。我們走了十多分鐘之後，看到一所歷史博物館，再向西北方走了不久，到了一條稱為REU THEODORE DE BÈZE的巷路，並偶然地看到「加爾文學院」（Collège Calvin）的正門入口。雖然我們知道必將參觀此學院，但為了趕上開會時間，所以置之不理。在這時候，我們亦看見聖彼得寺院之青銅色的尖塔，聳立在大小不同樓屋所擁擠的日內瓦舊市街中心地帶裏。這是我們找路的一個好目標。這樣地我們向聖彼得寺院的尖塔走路不久，又回到昨天晚上開會典禮之會場「加爾文講堂」（Auditoire de Calvin）了。此所緊接在聖彼得寺院的「南塔」（Le tur Sud）傍邊之「加爾文講堂」，原稱為「馬利亞教會」（l'église de Notre-Dame-la-Neuve）之一所禮拜堂，但自1562年起由加爾文和伯薩改稱為「亞卡得彌」（l'Académie）講

SHM p.31-42

No. 6 March

1984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第六期

台灣神學論刊

TAIWAN JOURNAL OF THEOLOGY

